上海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研讨会论文集

上海人民出版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

目　　录

前　言…… 1

中国共产党与抗日战争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理念与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奚洁人　3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的政治动员能力探析
——以陕甘宁边区抗日根据地为个案考察…… 李春峰　17
略述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战文化的功绩及其经验…… 张玉菡　28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宣传工作…… 吴珍美　38
论新四军对全国抗日战争的历史贡献…… 孙道同　郭秋琴　47
陈毅在华中敌后的抗日统战工作及卓越贡献
…… 胡　光　王　芳　62

上海与抗日战争

上海对抗日战争的贡献…… 苏智良　江文君　73
八年抗战中的沪郊抗日游击队…… 朱　华　88
淞沪抗战与爱国主义…… 唐莲英　95
淞沪抗战历史经验教训的现实反思…… 佟明忠　德　川　106
略论抗战时期上海党组织领导能力的重大提升…… 陈丽凤　117
上海抗战文化的发展与抗争…… 朱敏彦　齐卫平　130

上海沦陷后上海文化人的文化活动…… 庄俊芳 144
简论宋庆龄在“武卫会”工作中的贡献…… 郭绪印 152
试论抗战时期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 周小燕 163
杨文道与上海抗日救亡运动…… 邵 雍 167
抗战初期上海民营工厂之内迁及意义…… 蔡 亮 177
从《申报》看同乡组织在淞沪抗战中的难民救助…… 高红霞 190
上海犹太人与抗日战争…… 王 健 潘 光 201
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与一·二八事变…… 朱 华 212
震惊淞沪的日军青东大屠杀以及抗日军民的殊死
斗争…… 李蕊珍 229
日本帝国主义摧残上海文教新闻事业罪行述评…… 郭太风 238
上海四川北路周围的慰安所研究…… 姚 霏 252
“三极”与“灰色”
——评日本学者古厩忠夫的“战时上海”学说…… 葛 涛 272

抗日战争专题研究

抗日战争对现代国家观念的锤炼…… 张元隆 283
论史迪威主张与中国共产党合作的原因…… 陈 挥 294
上海盟国侨民集中营述论…… 熊月之 305
日伪战时农业掠夺政策述评
——以华中米粮统制政策为研究对象…… 张 云 335
试析日本军票在华中的出笼…… 杨天亮 345
试论日本投降后在江南地区的缴械…… 李美华 夏正伟 354
提篮桥监狱对日本战犯的关押、审判与执行 …… 徐家俊 368
简论加强日军侵华罪行研究的意义…… 张 铨 383

后 记…… 397

前　言

抗日战争是20世纪中国波澜壮阔历史进程中具有深远影响的重大事件，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今天，这场战争已过去60年了，战争的硝烟也早已消散，但我们仍然处处可感受到它的意义及影响力，历久不衰地吸引着人们的研究。

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百余年来抵御外敌入侵所取得的第一次完全胜利的战争，中华民族也在战火的洗礼中获得新生。在这场战争中，中华民族万众一心，同仇敌忾，以巨大的民族牺牲，战胜了凶残的日本法西斯侵略者，洗雪了历史的耻辱。这场战争，对于中华民族来说，还有着凤凰涅槃般的象征意义，它锤炼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道路上的一个历史性转折点。

抗日战争不仅是中国人民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而且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抗击法西斯侵略最早，持续时间最长。中国人民英勇、持久的抗战，牵制和消耗了日本陆军的主要兵力，打乱了日本的侵略计划，有效地配合了世界反法西斯盟国的作战。对于中国抗日战争的国际意义，美国总统罗斯福曾指出，不断加强的“中国壮丽的防御战”，是阻止法西斯德国征服世界计划完成的重要因素之一。斯大林也赞扬说，“中国人民及其解放军的斗争，大大便利了击溃日本侵略力量的事业”。正是中国人民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所作出的重大贡献，初步奠定了中国作为世界大国的地位。

上海作为当时中国的经济文化中心，在全国抗战中有着极其

重要的地位。在上海，曾先后发生了“一·二八”和“八一三”两次著名的战役，涌现出了“十九路军”和“八百壮士”这样的英勇部队。特别是八一三淞沪会战，其战役规模之巨大，作战过程之持续，作战伤亡之严重，战斗之悲壮惨烈，不仅在中国抗日战争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而且在中外战争史上也都是罕见的。许多研究成果概括了上海在全国抗战中的地位：它是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重要中心，是抗日战争的军事战略重镇和主要战场之一，是抗战文化的发源地，是抗日战争特殊的后勤基地，是联结世界的主要纽带。

历史是一本最富哲理的教科书。抗日战争是一幅洋溢着中国人民爱国主义精神的历史画卷，是一部悲壮雄浑、内涵丰富的民族史诗，值得我们从不同视角不同层面进行深入的研究与解读。为了推动抗日战争历史的研究，充分认识抗日战争的伟大意义，深刻总结抗日战争的历史经验，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 60 周年之际，上海市政协、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上海社会科学院等单位于 2005 年年初启动了研讨会的筹备及征文工作，得到了社会各界的积极响应。现在出版的这本论文集，就是在这次研讨会的征文中选辑的，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本市抗日战争历史研究的最新成果。

牢记历史、不忘过去，是为了更好地珍爱和平、把握现实、开创未来。让我们从伟大的抗日战争中吸取更多的启示和力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

王荣华

2005 年 7 月 10 日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

中国共产党与抗日战争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理念与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奚洁人

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全民族的、彻底的抗战。中国共产党以其科学、正确的领导理念和战争策略实现了对这场战争的思想领导、政治领导，成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中国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本文拟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以及党的示范作用等方面，对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的领导理念进行阐释，揭示这些领导理念的具体内涵及其与抗日战争胜利的逻辑关系，以期对当前执政条件下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供借鉴，对当代全球化背景下党领导人民实现中华民族新的伟大复兴的伟业有所启示。

一、“战争的目的是消灭战争”——抗日战争的胜利是正义战争对非正义战争的伟大胜利

中国共产党的科学战争观是正确判断战争性质，纯清民众对战争的模糊认识，克服消极情绪，鼓舞民族士气的重要前提。

早在瓦窑堡会议上，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中，就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要把中国变为自己殖民地的阴谋。毛泽东曾高瞻远瞩地指出：在中日这样一个决死的战争中，日本发动战争的目的是出于帝国主义侵略、扩张的本性，它和所有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一样，是退步的、非正义的；与此相反，中国抗日

战争的政治目的是“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国”，是反对侵略，捍卫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战争。不仅如此，由于它发生在十月革命胜利后，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它是神圣的、进步的、正义的。

以正义反对非正义，以正义战争来消灭非正义战争，这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基本价值方针，是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辩证法。因此，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也是正义对于非正义的胜利。

抗日战争的正义性，即中国共产党人对这场战争的性质和未来趋势的科学判断，成为激励民族自信、指引中国人民争取抗战胜利的一面旗帜。在这面旗帜的激励和指引下，中国人民为“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国”而战，为“永久和平而战”，抗日战争从最初的片面抗战发展成为一场全面的、彻底的、民族的解放战争。

抗日战争的全面性，首先表现在参与这场战争的民众的广泛性，在于它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真正成为一场全民族的抗战。战争爆发后，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成为中国革命面临的首要问题，能否发动全民族共同抗战，成为这场战争胜利的关键。1938 年毛泽东在《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中明确强调：这场反侵略战争“不但是国内各个党派各个阶级的，而且是国内各个民族的。针对着敌人已经进行并还将加紧进行分裂我国内各少数民族的诡计，当前的第十三个任务，就在于团结各民族为一体，共同对付日寇”[1]。正是在共产党的这种倡导和推动下，中国的各个党派和进步社会团体、各个民族、各个阶级、各个宗教团体包括海外华侨都投入到了波澜壮阔的抗日洪流中，筑成了中华民族团结御辱的钢铁长城。众所周知的东北抗日联军、华北的马本斋回民支队、琼崖抗日自卫队等少数民族成立的著名抗日武装，在白山黑水之间、林海雪原之中、黄土高原之上、南国密林深处沉重地打击了侵略者，谱成了一曲雄浑有力的各族人民团结协作的抗战交响曲。

抗日战争的全面性，还表现在它的革命彻底性，在于它以以往所没有的姿态，彻底地反对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中国近代史上，曾经发生了无数次中国人民反抗外国侵略、争取民族独立的革命斗争，并在不同程度上打击了西方列强的侵略。但由于阶级和历史的局限性，他们在反对外国侵略、争取民族解放的程度上是不彻底的。中国共产党不仅把抗日战争纳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阵线，而且使其汇入世界民族、民主革命的进步潮流，使这场战争具有双重政治意义。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新民主主义的力量以及中国人民的政治觉悟在战争中之所以能够获得日益壮大和提升，是同党的这个政治理念分不开的。这样，抗日战争的胜利，就为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抗日战争的全面性，还表现在它引发社会变革的深刻性，在于它推动了中国社会从传统到现代、从从属到独立、从被动开放到主动融入社会的变革。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部分，抗日战争已经超越了单纯军事意义上的战争，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主根据地实行的政治、经济、文化政策，改变了旧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引发了中国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深刻变革，成为中国从传统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向现代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枢纽。同时，抗战期间中国在与国际反法西斯同盟国家和世界其他民族的交往与合作中，中华民族开始以开放的眼光面向世界，这也成为中国改变近代以来的被动开放格局、主动融入国际社会的开端。

因此，以正义的、革命的战争消灭非正义的、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这种马克思主义的战争观是共产党抗战领导理念的逻辑起点，也是抗战胜利的理论基石。

二、“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在于民众之中”——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通过建立统一战线、实行广泛而有效的政治动员的成功范例

抗日战争是一场人民战争，人民战争必须唤起民众，赢得民众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

的支持，才能赢得战争的胜利。如何唤起民众？最重要的有两条：一是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二是通过统一战线实行最为广泛的社会政治动员。

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由抗战性质以及中日双方的力量对比所决定的唯一正确的政治方针，也是党进行政治动员的重要路径。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及其在抗战中的运用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理念、领导策略和领导艺术的成功典范：

首先，从民族利益的大局出发，正确处理好中日民族矛盾与国内阶级矛盾的关系，坚持把民族矛盾作为主要矛盾放在首位。这种领导理念的创新，缓和了国内阶级矛盾，扩大了统一战线的阵营，并使党赢得了政治上的主动。

其次，通过采取既统一又独立，既联合又斗争的政治策略和斗争艺术，坚持了党在统一战线中思想上、政治上的领导权和组织上的独立性。

第三，坚持把国内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联系起来。这种新的领导理念，为主动争取抗战的国际援助和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中华民族的应有贡献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政治通道。

能否唤起与组织民众，在战争中不断增强党的政治动员力，决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治功能的强弱，也是衡量一个政党凝聚力和领导力的重要尺度。担负领导中华民族抗战历史重任的共产党人比任何时候都更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因此，在积极倡导、构建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爱国统一战线的同时，中国共产党充分发挥统一战线的功能，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广泛而深入的社会政治动员，从而组织起浩浩荡荡的抗日大军。

在这支抗日大军中，有我们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也有国民党的爱国将领和士兵，包括了党在各个历史时期的朋友，甚至在

国内战争时期曾经敌对的人在内，有海内外各界爱国人士，有世界反法西斯阵营的盟友，也有日本等法西斯国家中的人民和士兵。最值得一提的是党对占中国人口 80％以上的农民的成功组织和动员，可以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奇观，特别是那些经过组织、训练和武装起来的农民，成为这支队伍的主力军；仅以晋西北为例，到 1938 年 6 月，组织起来的农民就达二十万人，其中青年和妇女有十万人。在五台县，工、农、学、商、妇、儿童抗敌会组织起来了。经这些群众团体或战斗小组组织起来的广大群众，构成了抗战中“比绵延的堡垒和堑壕还要机警和有伸缩性得多的活的屏障”。史沫特莱、斯特朗、斯诺等一批到过抗日根据地、感受过中国共产党抗战动员的外国记者曾惊叹道：“中国的游击区开展了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群众动员和群众教育。领导这种运动的游击区政权之所以能够存在和壮大，是因为他们赢得了农民，特别是青年农民的衷心拥护。”[2]

中国共产党何以能在抗战中具有如此巨大的社会动员力？其一是由于它高举了民族、爱国的大旗，具有鲜明的价值导向。爱国主义是一种崇高的民族感情，一旦被激发起来，就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和精神动员力；其二是由于它具有统一战线这种政治组织形式。这种政治组织形式特别具有广泛性和包容性，而且它还由许多具体的组织形式组成一定的组织体系，如在抗战中的抗日救国会等；其三，是由于它十分注意宣传动员主体和形式的多样性。戏剧、歌曲、标语口号、宣传画、演讲会等这些为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都成为撒播抗日火种、激发抗日热情的有力武器。从上层社会、知识分子一直到普通的农民都被发动起来成为宣传、动员的主体。一位外国记者曾这样记述他所亲眼目睹的农民抗战的演说会：“一个生平第一次登台的农民，他的演说并没有什么技巧，但当他举起紧握的拳头，义愤填膺地说‘侵略者已经来到此地，抢夺我们的土地，烧毁我们的家庭了。’怒吼着‘谁说我们不能打日本矮奴和

他们的走狗？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一切汉奸！'的时候，汗从他的头发丛中滴出来，台下那些群众便高声喊着口号。"[3]一旦人民自己成为宣传动员抗战的主人，就具有了不可估量的社会动员力。这是中国的抗战之所以能以弱胜强并最终取得胜利的最深厚之社会根源。

三、"从军事理论的研究，引起兴趣，唤起全党注意于军事问题的研究"——正确把握与运用军事辩证法是指导抗日战争走向胜利的军事保证

毫无疑义，要领导一场战争取得胜利，必须要有正确的军事战略，而确立这种军事战略的前提是由该场战争的性质和特征所决定的。中国共产党最重大的贡献之一，是在客观分析中日双方各自特点和力量对比的基础上，科学地确定了抗日战争的持久战性质及其基本战略。从战争一开始，国内就存在着"亡国论"和"速胜论"两种不同的看法。毛泽东同志的《论持久战》，从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等诸方面正确地分析了中日双方的力量对比后，有力地批驳了上述两种谬论，作出了抗日战争是一场持久战的科学论断，强调最后胜利一定属于中国人民，并由此制定了相应的战略和战术，这些战略、战术充满着马克思主义的军事辩证法。《论持久战》的发表，照亮了中国人民的心，一时间从政治领袖人物、军人到普通的知识分子争相阅读，成为指引战争胜利的指路明灯。

《论持久战》的军事辩证法，首先在于具体地、历史地分析、预测了这场战争的发展历程，科学地设想它要经历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等三个历史阶段。这三个阶段将通过我方积极发挥能动性，改变双方力量的客观对比，从而使我方力量从弱势到均衡再到优势、而敌方力量从优势到均衡到弱势。敌我双方力量对比的变化决定了战争持续时间的长短，也决定了我们进行战略反攻条件的成熟与否。这种分析与预测，是基于对中国革命战争规律的深刻把握，基于对这场战争中敌强我弱、敌小我大、敌退步我进

步、敌寡助我多助等各种对比因素的深刻认识，以及这些因素间的相互关系和变化趋势的科学分析。实践已经证明这种分析是同战争发展的客观进程相符合的。

其次，这种军事辩证法又具体体现在内线与外线、持久与速决、进攻与防御等军事作战原则的辩证关系上。一是以战役和战斗中的进攻战实现战略上的防御。在战争初期，由于敌强我弱的基本情况，人民军队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如何保存自己，待机破敌。这决定了我军在与敌军争胜的过程中往往不是一开始就采取攻势，而是采取退却、防守。但这种防御不是消极的，而是通过积极的战役的进攻，实现战略防御的目标。二是以战役和战斗中的速决战实现战略上的相持。这体现了毛泽东一贯的“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敌人”的军事思想。应该在适当的时间、适当的地点，集中尽可能多的兵力，采取秘密和神速的行动，出其不意地袭击敌人，尽量避免持久的阵地的消耗战。这样才能最有效地保存自己，消灭敌人，以在此消彼长中改变敌我力量的对比，为第三阶段的反攻准备条件。三是以战役和战斗的外线实现战略上的内线作战。从整个战略上来说，敌方是外线作战，我方是内线作战。但由于敌方兵力有限，我方主力军在内线、游击队在外线，完全可能从内外线形成对敌人的夹击之势，从而使整个战线呈现犬牙交错的态势。

第三，在抗日战争中，游击战的作用不仅在于配合正规军作战，而且是人民参加战争的最主要的形式，因此游击战本身就具有了独立的战略价值，关于抗日战争中的游击战的战略战术问题，是这种军事辩证法的又一杰出贡献。根据 1937 年中央当时制定的《全国抗战之战略计划及作战原则案》，“游击战线应摆在敌人之前后左右，以分散敌人，迷惑敌人，疲倦敌人，肃清敌人耳目，破坏敌人之资材地带，以造成有利条件，有利时机，使主力在运动中歼灭敌人。”[4]而在整个战争期间，游击战争也确实充分发挥了我方

“天时、地利、人和”等优势，深入敌占区敌方兵力不足的空虚地带，极大地牵制、消耗了敌人实力，成为与正规军并肩战斗的极其重要的力量和形式。在艰苦的八年抗战中，中国共产党领导敌后军民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游击战争，有力地抗击了日本侵略者，创造了诸如麻雀战、地道战、地雷战、水上游击战等极为有效的歼敌方法，以粉碎敌人的“扫荡”、“清乡”和“蚕食”活动。据《中国抗日战争史》记载，仅在 1941 和 1942 两年中，八路军、新四军和游击队、民兵就作战四万二千余次，毙伤俘日、伪军三十三万一千人。抗日游击战争以其开展范围之广、规模之大、持续之久、形式之灵活，成为人类战争史上一个奇特的案例，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华民族对于世界军事理论的一个伟大贡献。

四、“战争不但是军事的和政治的竞赛，还是经济的竞赛”——战时经济政策的实行为抗战胜利奠定了重要物质基础

在与敌人进行政治斗争和军事较量的同时，中国共产党从抗战需要和中国革命的最终目标出发，在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积极实行了减租减息等一系列经济政策，充分保证了抗战的军事、政治目标的实现。“战争不但是军事的和政治的竞赛，还是经济的竞赛，”[5]尤其对抗日战争这样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更是如此。

实行抗战时期的特殊经济政策，首先是巩固统一战线的政治需要。抗战爆发后，为了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民主根据地把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及时转变为抗战时期的减租减息政策。一方面削弱了封建制度对农民的盘剥，改善了农民生活状况，促进了抗日根据地的农业生产和经济发展。另一方面也适当保护了地主阶级、富农及开明绅士参加抗日的积极性，巩固和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事实证明，减租减息是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调节农民与地主这两个对立阶级之间相互利益和关系的有效政策。农民是

中国革命的主力军，也是抗战的主力军。在共产党的政治动员和经济政策的影响下，不但农民群众的抗日积极性被调动起来了，而且根据地的许多开明绅士也都积极投入到支持抗战的队伍中来，从财力、物力、人力方面对抗战做出了贡献，有的甚至献出自己的生命。[6]

其次，抗日根据地自力更生的经济政策直接转化为对于战争的物质支持，就是保障供给。在1941—1942年抗日战争处于战略相持的困难时期，日本侵略者的野蛮进攻和国民党军队的包围封锁，使陕甘宁边区发生了极大的财政困难，八路军几乎到了没有衣穿、没有菜吃、冬天没有被子盖，举步维艰的地步。为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共产党采取“发展经济、保障供给”以及“公私兼顾、军民兼顾”的方针，领导边区和根据地军民广泛开展了大生产运动，实行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八路军三五九旅在王震同志率领下把南泥湾几十里荒滩变为肥沃的粮田，成为全军大生产运动的模范。大生产运动密切了解放区军民之间、政府与群众之间的关系，保证了边区军民军事斗争和生活供给。

再次，通过“对外调剂、对内自由”发展商业，也是抗日根据地发展经济建设、打破敌人经济封锁的重大措施。通过对外贸易采取统制，根据地内部进行自由贸易这样的政策，把根据地不必需的东西卖出去，把急需的物资（尤其是军用物资）换回来，有效地保证了军需民用物资的供应。此外，共产党在根据地还发展了合作社组织，创办了银行并统一边区货币为“边币”（或抗币），同时还加强财政建设，废除摊派制度，实行合理负担政策，既取消了苛捐杂税减轻了农民负担，又保证了军费开支。

当革命的形势已经改变的时候，革命的策略，革命的领导方式，也必须随之而改变。中国共产党根据抗战需要在敌后抗日根据地实行了一系列新的经济政策，调动了人民的抗战积极性，加强了对战争的物质供给，也为全国人民重视战时的物质生产以支持

和赢得战争胜利作出了榜样。

五、“文化是革命的有力武器”——抗日战争的胜利是新民主主义文化的伟大胜利

文化，尤其是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以巨大的反作用。

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主要内容的民族精神，反对封建主义的和卖国投降的奴性文化，是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的新方向。这种文化的民族性，体现在它坚决反对帝国主义殖民文化、维护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体现在它既充分展示民族特色又能以开放心态吸收外来文化的优秀成分；它的科学性，体现在它彻底地反封建、反迷信，反对一切剥削阶级的世界观；它的大众性，体现在它倡导为人民大众服务，并以他们的劳动实践作为自己的创造源泉，这种文化是不同于以往任何剥削阶级文化的，是真正属于人民自己的文化。

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人民的文化，进步的文化，是推进和保障人民战争赢得胜利的抗战文化。它在抗战前，能唤醒民众，是进行抗战的思想准备；在抗战中，能团结民众，是抗战总战线中的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

唤醒民众，首要的是激发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爱国精神和抵御侵略的斗志。在黑暗的封建军阀统治和帝国主义的奴役下，很多中国人对生存处境逆来顺受，对革命前途认识不清。因此，在抗战中，“全民族的第一个任务，在于高度发扬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克服一部分人的悲观恐惧情绪，坚决拥护正确的抗战方针，反对任何投降妥协的企图，坚持抗战到底。”[7] 抗战时的文化教育政策，也“应以提高和普及人民大众的抗日的知识技能和民族自尊心为中心”[8]。抗战开始后，解放区的文艺运动紧密结合抗战的需要和群众的文化要求，迅速和普遍地发展起来。文艺工作者创作了

许多反映工农兵斗争生活的、为工农兵所喜闻乐见的作品，如《兄妹开荒》、《白毛女》、《小二黑结婚》等。国统区的抗战文艺也得到蓬勃发展。如郭沫若取材于历史事实的《屈原》等六部剧本，通过剪裁与安排历史故事，曲折地反映了当时的重大政治事件，对于教育群众团结抗战起到了显著作用。

团结民众，重要的是振奋民族精神，以民族文化为纽带，去团结、激励和增强抗日部队、全国人民，乃至全体炎黄子孙的抗日凝聚力、战斗力。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的影响和推动下，全国文艺界成立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有力地团结了文艺界人士和知识分子，使他们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在抗战文化运动中，文化工作者以“文章下乡文人入伍”相号召，纷纷走上前线，到游击队中去，到伤兵医院去，到难民收容所去，到内地城市和乡村中去，用抗战文化激励民众，鼓舞战士，直接为反侵略的民族解放战争服务。

在这场规模空前的抗战文化运动中，各种抗日救亡的进步报刊书籍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一大批反映抗战题材的优秀戏剧、歌曲、影片、诗歌等文艺作品也相继问世。抗战歌声响彻中华大地，《义勇军进行曲》、《全民抗战》、《到敌人后方去》、《太行山上》、《游击队员之歌》、《送郎上前线》、《大刀进行曲》等歌曲家喻户晓，嘹亮的抗战歌声成为激发起整个中华民族奋起抗战的号角。诗人们和剧作家也用极富感染力的诗歌作号角“吼出弱小民族反抗强权的激怒”，“唱出民族战士英勇的成绩”。革命剧作家田汉曾这样评价过戏剧对抗战的作用：“中国自有戏剧以来，没有对国家民族起过这样伟大的显著的作用，抗战以前戏剧尽了推动抗战的作用；抗战开始以后，戏剧又尽了支持抗战鼓动抗战的作用。”[9]优秀的抗战文化和文艺作品，成为鼓舞人民抗战斗志、激发民族自信心的精神食粮。抗战时期的文化宣传和教育，也在民众的思想上筑起了抵御日本侵略的坚不可摧的精神堡垒，成为党带领人民向敌人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